

随笔

父亲是我一生的骄傲

李纪龙

陪着老母亲去生态园观光,望着平静的湖水,心潮澎湃,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我最敬重的人——父亲。

父亲生于1932年,是喝着黄河故道的水、踩着黄泥巴长大的苦命人,年轻时就从事农村基层工作,先后任生产队会计、队长、大队支书、“五七”园艺场场长。

父亲做农村基层工作时,带领乡亲们苦干实干,一心惠民。三年困难时期,家里揭不开锅,副队长悄悄地给每家分一点粮食,也给我家送了一小袋。父亲眼睛一瞪:“队里的粮是大家的命,我饿死也不要!”结果我两个年幼的哥哥和84岁的老太爷因饥饿加上疾病,在两周内先后离世。而后,我们一家人靠着挖野菜、剥树皮熬过那一段日子。

父亲在知青场工作格外操心。那时的黄河故道,盐碱地白茫茫一片,种不成庄稼。父亲带着来自上海、郑州和淮阳的下乡知识青年,翻淤压沙,没日没夜地改良土壤,硬是把一片片不毛之地变成了良田。那些城里来的年轻人,哪吃过这样的苦,父亲既当领导又当爹娘,白天教他们干农活,晚上给他们讲黄河的故事,做思

想政治工作,鼓励年轻人“滚一身泥巴,炼一颗红心”。有个上海知青腰扭伤了,父亲连夜带他去治疗,并请来民间医者为他捏腰治病、舒展筋骨。知青们感叹:“李师傅待我们如同子女,让我们感觉温暖如春。”

父亲清正廉明,和蔼可亲。20世纪70年代,农村文化生活贫乏,最大的娱乐就是偶尔看场露天电影,而看电影常常要在黑夜里跑上三五里。有一天,“五七”园艺场放电影,我和二姐一起去看,因人多看不到,我就跑到父亲的办公室搬了一把椅子站在上面看。电影结束后,我们给父亲送椅子时等了好久,不见父亲回来。椅子放不到屋里怕丢了,无奈之下,我们就扛着椅子回家了。我和姐姐刚到家,父亲就回来了,一进门就问:“孩儿,你把看电影用的椅子放哪里了?”“您办公室的门锁了,放外面怕人拿走,就扛回来了。”父亲说了声“这是公家的东西,不能放咱家”,扛着椅子连夜回园艺场了。

一把椅子劳驾父亲连夜回来取,我愧疚万分。父亲公私分明,诚实刚正的品格在我幼小的心里打下深深的烙印。时至今日,我虽已年过半百,

做校长20多个春秋,但从未拿过集体的一点东西,从未做过一件亏心事,一向公私分明,阳光处世、清白做人。我在打油诗《自画像》中写道:“不嗜烟酒不玩钱,不读读书不偷懒。不失率真不追风,不惧权势不欺软。不搞阴谋不损人,不折腰板不食言。不做坏事不亏心,不羞子孙不愧天。”虽然有点不合时宜,近似于“傻子”,但我心安、坦然。

父亲大公无私,严于律己。想起1975年我上高中的事,更是记忆犹新。当时乡下孩子读高中需要逐级推荐,有一天,我因为这件事去园艺场找父亲,当时父亲是园艺场的负责人,正领着下乡知识青年出阵。我怕影响父亲干活,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等待。过了一个多小时,还不见父亲休息,无奈,我走到父亲身边,对他说:“爹,我听说今年上高中需要推荐,咱大队50多名初中生只有7个推荐名额。我不怕考试,就怕别人……”父亲手中的活都没停,一边转着热炕头一边淡淡地说:“推荐着咱就上高中,推荐不了就回来务农呗。”我本想请父亲跟人打个招呼,以免失去读高中的机会,没想

到父亲如此。我失望地回到家中暗自用功,发奋学习,凭借优异成绩和良好表现,顺利进入淮阳八中,为1977年参加高考创造了条件。

父亲习武健身,颇有功力。1984年,父亲参加在开封举行的“全省老拳师献艺表演比赛”,荣获一等奖。1996年,因习练铁头功和铁砂掌过度,造成脑梗死,从此父亲强壮的身体不再灵活。父亲生性乐观,他积极配合治疗,却是三次治愈又复发。脑梗死把刚强的父亲折磨得身心疲惫、痛苦不堪。2002年的那场大雪,治愈了父亲所有的病痛,他去了。我当时认为苦命的父亲终于不再受罪,可父亲仙逝半年后,我时常想起父亲,强烈地思念他,常常暗自落泪。

父亲一生辛劳,公而忘私,为人刚正,铁骨铮铮。正是父亲常说“靠山山倒,靠水水跑,靠父母要老,靠自己最好”的道理,使我受益终生。回眸我走过的路,无论是参加高考、耕耘杏坛,还是习武修身、齐家教子,取得的成绩无一不是靠自身的勤奋和执着。

我为有这样的好父亲而自豪!

诗歌

仲春小咏

露白

春约

春风虽料峭,暮雪已消融。
且驾青骢去,相看十里红。

寻芳

虽非桃李年,独爱芳菲节。
况是去年冬,遥思一天雪。

雪晴

洲中凫乍起,岸上鸟争鸣。
雪白花红处,春风拂面轻。

题句

草绿映花红,春风随处好。
江南二月天,几见诗人老。

问君

问君何处在,我自踏芳尘。
莫道花初发,春风不待人。

春思

相思非晓露,所忆是春风。
去我三千里,怀君一梦中。

我与祝总编

钟祥

日前偶见庆《周口日报》创刊35周年征文启事。庆创刊,当然离不开创刊的人,于是我就很自然地想起了《周口日报》创刊时期带领我们日夜苦干的祝总编,尽管我们都已退休多年。

祝总编大名祝培星,虽称其为总编,其实他只是副总编。周口日报社领导走了一任又一任,唯有他坚守不出,干到退休。

我是在周口日报社成立的第二年被招进去的。当初的办公地点在六一路红杏影院内,后来又搬到七一路新建的办公楼。在这栋办公楼里,我和祝总编的办公室都在二楼,且是斜对面,中间只隔一走廊。这样一来,我俩便低头不见抬头见。那时出报纸不像现在网络化、数字化,基本上都是手工操作,如改稿、定稿、画版、定版,都在纸上进行,导致程序多、跑腿多。每当祝总编带班的时候,若轮到我值班,不需电话,他在办公室一声喝,我立马到。这样,就会不断地听到祝总编的声音:“钟祥,拿稿来!”“钟祥,送版去!”他嗓门洪亮,声震屋瓦,余音绕梁。一听到喊声,我就会三步并作两步,去他办公室拿稿、拿版。当时我想:这样呼来唤去,咋咋呼呼的,哪像在出神圣的报纸,简直是在开店,他是掌柜的,我成了跑堂的店小二。

祝总编不但对我“声控”指挥,对其他邻近的编辑、记者也是如此这般,因此整个二层楼不时回荡着祝总编那引车卖浆般的吆喝声。后来,我对这声音由反感到适应,再由适应到喜欢,且喜欢得一日不听就不自在。有一天中午11点了,未听其声音传出,整个二楼办公区一片死寂,了无生机;我也无精打采,昏昏欲睡。这时,楼道里突然一声吼:“赵XX拿版来!”祝总编的声音犹如冲锋号,我听了一激灵,来了精神——竟然慢慢地对此声音产生了依赖。接着,二楼恢复了生机:祝总编的喊声、同事们的应答声、匆忙的脚步声、“嘭嘭”的关门声,一派热闹的景象。其他的不说,仅祝总编的高音亮嗓便足以鼓动三军士气!

祝总编常说的一句话是:“咱都是吃这张小报的,可要好好弄啊!”意思是,这张报纸就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所在,如果弄不好,饭碗就砸了。如古语所说:“皮之不存,毛将焉附?”所以祝总编为了工作,除了吃饭,很少回家。后来,他干脆买了一张床,住进了办公室。见此情景,我为他作了一首打油诗:“祝总工作实在狂,办公室里铺大床。朝朝暮暮恋版面,直把报纸作新娘。”同事们也仿着“拼命三郎”给他起了一个名字“培星一郎”。

祝总编的办公室对面是洗手

间,可以冲澡、洗衣,每到天热时,就经常见他来往于办公室与洗手间,洗头、洗衣。他上穿大汗衫,下着大裤衩,脚蹬大拖鞋,手拿芭蕉扇,走起路来左右摇晃,远看像一位行者,近看像一个杀猪的。祝总编如此不修边幅、素面朝天,其人也豪爽洒脱、襟怀坦荡、心无芥蒂,实乃性情中人。

祝总编虽在生活中大大咧咧、不拘小节,然在工作中是极认真的,一丝不苟。谁若有了错误,他会严厉地批评,不留情面,但你若给他提意见,他也坦然接受。一次,我在值班时出现一个小失误,他便在会上进行了批评。那时我刚出大学校门,又是单位唯一的研究生,一腔浩然之气,胸怀不世之志,大有孟圣人“舍我其谁”之概,不论他是哪路神仙,一概睥睨之。对祝总编此等轻蔑焉能容忍!于是,散会后我便找他理论。我怒气冲冲推门而入,声色俱厉,痛陈其不顾事实、妄加批评。面对我连珠炮式的“进攻”,祝总编的反应比较诡异:他始而倾耳静听,继而稍稍皱眉头,最后则作假寐状,真是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,这情景现在想起来仍让人后背发凉。我见他毫无动静,便悻悻然退出。后来我才悟到:与顶头上司冲突,这不是以卵击石吗?何其愚也!幸亏祝总编能包容,有定力,以静制动,且不计前嫌。若换一个别的头儿,遭如此冒犯,他或逞匹夫之勇,拍案而起,大打出手;或心胸狭隘,包藏祸心,挟嫌报复,我辈惨矣!几天后,祝总编见了我还是乐呵呵的,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,对我仍以“教授”相称——这是他给我起的绰号,这个绰号是何来历,我不得而知。果不其然,数年后,我调进了师范学院,真的成了教授。每当忆及此事,我就纳闷:难道祝总编数年前就知道我会成为教授?祝总编真乃神人也!

现在,或许是缘分使然,在沙颍河之滨,我与祝总编仍是比邻而居,在河堤上散步时,每每不期而遇。当他看到我时,远远地依偎在喊:“教授!教授!”这声音仍是那么洪亮、那么熟悉,但听到时的感觉与当年截然不同:那时,听着听着就笑了,因为我不是教授;而今,听着听着就哭了,因为我已成了教授。我好像再让祝总编带我一次班,也好像再被他批评一次(这次绝不会再顶撞他了),但这已成了一种奢望,毕竟我们都已青春不再,垂垂老矣!过去那如火如荼、充满希望与幻想的岁月,正如东逝不息的沙颍河水,一去不复返,留下的只是这五味杂陈的咀嚼,且这种回味让我们情不自禁,因为正如一位哲人所说,我们走过的路,无论是平坦还是坎坷,都是一笔财富。



诗歌

春天的语言

田军

个世界

住在龙湖岸边多年
最熟悉那青青的烟柳
早与晚,又续写下最美的
颜色,和春天的语言
开门见天,辽阔的天空
有一种冲动的呐喊
微风轻轻拂面
路边、旷野、崖畔
谷兒、沟底、河岸
有名的、无名的,各种各样的
小草,和比小草更高的草
还有:有名的、无名的,各种各样的

二
燕子归来,流水潺潺
清新了整个世界
喜鹊在青翠的枝头
叽叽喳喳
燕子飞来飞去忙筑新巢
农民们在田间忙碌着希望
此刻,安静的世界又沸腾起来
人间又绿了一春

三
二月二,龙抬头
一切的生命都轻装上阵
若再来一场微雨
春天就更干净了



粉靥娇容

李军摄

散文

老树与父亲

王明见

父亲走后,我常常独自站在村口老槐树下出神。总恍惚看见父亲顶着那顶旧火车头帽,背着印有“忠于党的教育事业”几个字的褪色帆布包,踩着碎金般的余晖,从蜿蜒的土路尽头向我走来。

记忆里父亲相貌儒雅,说话亲切,为人实在,从不说假话。他曾经是校长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当别人问“一年三百斤粮食够吃吗”,他回答说“不够”;当有人问“一亩地能打三千斤麦子吗”,他认真解释“那是好多亩地的产量”。这份执拗让他从校长被“贬”为每月5块钱的民办教师,但这却让他乡亲们心里成了真正的“先生”。

父亲在学校仍然比谁工作都认真。每天天不亮,当第一缕曙光还未完全照亮大地,他便来到学校,把教

室打扫得一尘不染。放学后,他又常常留下,给成绩差的学生补课,直到他们完全理解。

父亲能书善画,过年时村里家家户户都贴有父亲书写的红对联,村里人家的山墙上常有他的墨宝。他画燕子衔泥,画荷花映日,画蝶舞芳丛,画艳阳蓝天……他常常教育孩子们:“画画儿要观察仔细才能画得活,才有生气。”于是,他笔下的牡丹仿佛能闻见香气,蝴蝶似乎随时会飞走。有个雨天,他为邻居家画新画山墙,雨水打湿衣衫也浑然不觉。那幅“松鹤延年”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在,颜色虽淡了些,却鲜活在我的记忆里,就像父亲的爱,永不褪色。

1979年那个清晨,父亲像往常一样早起去学校。雪大路滑,他穿着芦草鞋,踩着厚厚的积雪。路过坑

塘边的陡坡时,他脚下一滑,重重摔倒在地。他挣扎起身,拍了拍身上的雪,蹒跚着继续往学校走。谁也没想到,这一摔,竟为父亲埋下了病根。正月初八,父亲因脑出血已经说不出话来,只是用浑浊的目光望着我们,望着他无比熟悉的课本,眼角有泪滑落。那天夜里,父亲永远闭上了眼睛。

我们家的天塌了! 父亲乡亲们,还有父亲教过的学生都来了,那个曾经在寒冬里披着父亲棉袄上课的学生跪在灵前泣不成声:“王老师呀,那年要不是您把棉袄给我,我早就冻死了……”

一个月后,父亲的平反通知书送到了家里。母亲捧着通知书哭得几度晕厥:“你爹委屈了一辈子,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呀……”

父亲去世46年后的一天,我意

外踏入县档案局那略显昏暗的房间。我翻开父亲尘封已久的档案,泛黄的纸页轻轻发出沙沙的响声,似乎在诉说着父亲对教育事业的忠诚。一张父亲年轻时的照片映入我的视野,尽管面容与他50岁离世时的模样有所不同,但那熟悉的眉眼和温和的神情,瞬间如同一把钥匙,打开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之门。

那天夜里,我做了一个梦,梦中我就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,老槐树在风里摇晃着枝丫,沙沙声恰似当年父亲翻动课本的声响。父亲背着褪色帆布包,踩着碎金般的余晖,从蜿蜒的土路尽头向我走来。他走在春风里,他走在细雨中,他走在每一双渴求知识的眼睛里……

父亲呀,从来不曾离开我们,也从来不曾走下他的讲台!

35 见证·成长
周口日报创刊35周年征文
1990.8.1-2025.8.1